



寻找元文化

中华元文化丛书

XUNZHAO YUANWENHUA

刘明武◎著



常州大学 寻找元文化
中华元文化丛书
藏 书 章
XUNZHAGYUANWENHUA

刘明武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元文化 / 刘明武著.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220-08558-1

I. ①寻… II. ①刘… III. ①周易—研究
IV. ①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6013 号

XUNZHAO YUANWENHUA

寻找元文化

刘明武 著

策划组稿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王定宇
张丹
戴雨虹
蓝海
李进 王俊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 //www. scpph. com
http: //www. booksss. com. cn
E-mail: scrmcbf @ mail. sc. cninfo. 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5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6mm×208mm

印 张

7.5

字 数

166 千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220-08558-1

定 价

1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做人的理性 做事的智慧

——刘明武著《寻找元文化》序

阎纯德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往往局外者清。也许是熟视无睹，也许是习惯于重复相同的话语，局内人提不出的新问题，却被局外人提了出来。自然科学研究中有这样的情况，文化研究中有这样的情况。

具有独创性的大陆漂移说，是天文学家、气象学家 A. 魏格纳提出来的。研究《周易》且从中发现“二进制”的，并不是中国众多的《易》学研究者，而是德国的数学家莱布尼茨。

一个工程师涉足中华文化研究，短短两三年间，在北京与地方的重要报刊上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文章，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我不能不对此感到惊讶。现在，他的《寻找元文化》文集面世了，这实在令人欣慰。

这位工程师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把中华民族落后与挨打的根源归结在中华文化本身，有重新反思之必要。如果说中华文化本身有问题，那么，中华民族早期领先于世界的辉煌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代物理学表明，同一条件下不可能形成两种状态的冰与蒸气。化学实验证明，同一条件不可能造成一种物质的两种化学反应。在现



实生活中，先进有先进的道理，落后有落后的理由。一种原因不可能同时造就出先进与落后两种状态。那么，同一个中华文化会造就出中华民族辉煌与挨打的两种状态吗？研究中华民族的辉煌与挨打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文化的失传与变质。这位工程师就是我从未谋面而神交多年的刘明武。

在我主编《中国文化研究》的近十年中，所接触的专家学者，上至泰斗级文化大师，下至风华正茂的佼佼学者，以及一般文化研究者，其总数不下数百；所接触的关于文化的各类文章，不下数千。虽然杂志发表了许多好文章，但发表的并不篇篇都是金镂玉雕。学术研究一般应该言前人所不曾言，道别人所未道，那就是创新；我觉得刘明武的文章做到了这一点。他的文章不仅篇篇独具匠心、新意扑面，且磅礴之气中充满了智慧和灵性，读起来使人深受启迪。这在当今浮躁的半商业化的“学术”时代是很难得的。他在《中国文化研究》上发表的文章有四篇：一、《合和：中华文化精神之元》；二、《“象与器”简论》；三、《道与器的分离》；四、《是阴阳合和还是阳为阴纲》。当我初次看到刘明武的稿件时，第一感觉就是这篇文章是用心写的，没有“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味道；不仅如此，我还强烈地感到他对国家和民族的赤诚之心，发表时放在了第一栏目的第二条，和方立天先生的大作排在一起。刘明武后来说，这篇文章的发表对他具有非常意义，因为这是他刚刚开始的研究，如果没有这一基础，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成果（这使我想到，编辑是可以扼杀一个天才的）。此后，《人民政协报》、《东方》、《中州学刊》、《人文杂志》等多家报刊上也刊登了他的论文。和《中国文化研究》一样，大都在排版位置上给予了足

够重视。刘明武的论点很快产生了影响，有些文章被《光明日报》、《中国哲学》摘载与转载。《炎黄春秋》上发表了正面评价的文章。

刘明武把自然科学研究所必需的标准化与定量化引入了文化研究。在标准与定量的尺度下，他对中华文化的创建与演变做出一个这样的划分：一、中华元文化是“道器并重”的文化；二、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是“道器分离”的文化；三、董仲舒以后的文化是“伪道无器”的文化；四、鸦片战争以后的文化是“寻道找器”的文化。

刘明武对中华元文化是这样认识的：当地球上出现了人类之后，人类的祖先共同在关心着一系列相同相似的问题：天地万物从何而来？一男一女从何而来？应该如何做人？应该如何做事？同样的问题，《圣经》和《周易》却有着不同的答案。

《圣经》用一个形象的上帝解答了天地万物的起源、一男一女的诞生。《周易》认为天地之前没有任何有形的神灵，天地之前只是存在着—阴—阳两种原动力。正是在这两种原动力作用下，演化出了天地万物与最初的一男一女。在文字出现之前，—阴—阳在伏羲氏们的手下变成了两个抽象符号——阴爻与阳爻，有了文字之后，—阴—阳被《周易》界定为“道”。上帝与道都具有造物功能，但上帝是神，道是自然存在，这是两者之间的原则性差别。

关于如何做人，《圣经》主张人崇拜上帝，人必须以上帝的意志为行为准则。在《圣经》里，做人的道理源于神理。《周易》主张人效法天地、日月、四时、水火……总之，人应该效法自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天地变化，圣人效



之”……大人、圣人、君子，总而言之，凡是人都应该效法自然。君王与上帝，不能作为人的效法对象。在《周易》里，做人的理性源于自然之理。

关于如何做事，也有两种答案。《圣经》有一个美丽富足的伊甸园，所以亚当和夏娃不需要动手动脑、不需要发明创造，就可以尽情享受幸福生活。当亚当与夏娃试图创造出最简单的衣裳——用树叶遮体，马上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洪水伐世之后，人们准备在一个平原上建造一座“通天塔”，上帝知道此事后，实施了严厉的惩罚——变乱了人们的语言。语言不通，意见无法交流，“通天塔”的计划就此流产。从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上帝对人们运用智慧发明创造是持反对态度的。中华大地上没有伊甸园，要想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人们必须动手动脑发明创造。关于动手动脑发明创造，神话传说与经典记载中留下了一系列动人的故事：女娲炼石补天，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构木为巢，伏羲氏编织网罟，神农氏发明耒耜，黄帝发明衣裳、车船、白杵、弓矢……依靠自己的智慧来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早期中华民族的典型特征。与上帝不允许发明创造相反，道允许并启迪人们去发明创造。《周易》中的“尚象制器”与“道器转化”，是由道形成的发明创造哲理。“驼背捉蝉”、“庖丁解牛”、“魏伯阳炼丹”、“张衡做浑天仪”，这些都是利用道在实际层面的发明创造。离开了阴阳之道，就产生不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上帝反对发明创造，阴阳之道启迪发明创造，这是阴阳之道与上帝之间的又一差别。

刘明武认为：博大精深的中华元文化包含了两大方面的道理：一、形而上的道理；二、形而下的道理。形而上的道理集中在一个

“道”字上，形而下的道理集中在一个“器”字上。道，囊括了“宇宙人生”的哲理；器，囊括了发明创造的哲理。道用来指导理性地做人：理性地认识外部世界，理性地认识人类自身，理性地认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器用来指导智慧地做事：研究理论、发展生产与发明创造。道与器并列并重，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能分割分离。“道器并重”的文化里一有做人的理性，二有做事的智慧。

中华元文化有一个演变问题。刘明武以“道与器”为参照坐标，对元文化的演变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在孔子、老子这里，一个“器”字失传了，西汉以后，一个“道”字变质了。老子谈道反对器，孔子谈道不谈器，所以，中华元文化在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里已经有所失传。道器并重的文化，此处变成了道器分离的文化。董仲舒的“三纲”，变“一阴一阳之谓道”为“阳为阴纲之谓道”，这一变化是质的变化。阴阳之间的合和关系从此变质为纲目关系，人与人之间相互负责的合和关系从此变质为绝对服从的主奴关系。董仲舒之道与《周易》之道相较，有真伪之别。“三纲”里面没有“器”。道器并重的文化，在董仲舒这里变成了伪道无器的文化。一个器字，失传了；一个道字，变质了。失传了做事的智慧，变质了做人的理性，应该是中华民族后期落后的真正原因。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挨打，产生出了强烈激愤，激动的情绪取代了理智的分析，把落后与挨打的原因归结在了文化上。因子孙的无能而怪罪祖先，这等于把咸丰皇帝的责任推到了黄帝的身上。鸦片战争以后，又找文化又找器，所有的精力完全集中到了西方文化上，从



此，认真留心中华元文化的人不多了。关于这一点，刘明武这样说：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次又一次地挨打，一次又一次地割地赔款。“为什么会挨打？”朝野上下、武人与文人都开始反思，反思的主要结论有两个：1. “器”不如人！这是一个仅仅从现象上总结出的结论。2. 文化不如人！这是从深层次上反思出的结论。两个结论都不正确。前一种结论，只看到了枝叶而忘了根，看到了流而忘了源；后一种结论，混淆了“龙种”与“跳蚤”，混淆了清源与浊流。

“器”的落后，是文化的失传造成的。中华元文化里不但有“尚象制器”、“道器转化”的哲理，而且有“日新”之精神。在“尚象制器”哲理以及“日新”精神孕育下的中华民族特别能发明创造，早期的中华大地上不断地、经常地产生新的“器”——先进的劳动工具、先进的生活器具以及先进的自卫武器。

中华民族有文化！中华民族并不是一开始就愚昧、就落后、就受人欺负，恰恰相反，早期的中华民族以文明而先进著称于世界，这个文明而先进的中华民族并不是由外来文化改造出来的而是由真正的中华文化孕育出来的。早期的中华民族文明而先进，后期的中华民族落后又挨打，一个文化怎么会造就出一个民族的两种状态？落后的根源不在于文化的本身而在于文化的失传与变质。关于这一点，百年来的反思者似乎没有加以基本的辨别。

“中华民族有文化！”我认为，刘明武的这一结论，不是源于感情的冲动，而是源于冷静的分析。

中华元文化有一个演变问题，儒家文化也同样有一个演变问题。在标准化与定量化的尺度下，刘明武对儒家文化的演变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一、孔孟的儒家文化；二、“独尊儒术”后的儒家文化；三、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批判的儒家文化。孔孟的儒家文化是真正的儒家文化。“独尊儒术”后的儒家文化是皇帝所阉割改造过的文化，这个文化仅仅只是挂了儒家文化的招牌，应该定名为皇帝文化。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批判的儒家文化是皇帝文化而不是真正的儒家文化。他认为，“孔家店”不应该打倒，而应该打扫，应该把皇帝文化与真正的儒家文化区分开来。关于这一点，刘明武作了一个形象比喻：如果有人冒充“同仁堂”造假药，正确的态度是打造假者，而荒唐的态度是去打倒“同仁堂”。“孔家店”之店应该改做“殿堂”之殿，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殿——精神之殿。尽管孔夫子没有研究做事的智慧，但儒家文化里做人的道理并没有错。敢于主张“天下为公”的选贤与能，敢于批评“苛政猛于虎”，敢于歌颂“汤武革命”；提倡“爱人”，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提倡“男女同尊卑”；提倡“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仅此几条，就足以使儒家文化永远流传下去。

儒家文化应该尊重，但不应该“独尊”，因为儒家文化之前还有文化。儒家文化之前的文化里有做事的智慧。

民族复兴的最佳途径是文化复兴，而不是文化否定！为了民族复兴，能不能坐下来把中华文化从头到尾认真梳理一下呢？取其善，舍其不善。可以争论，但不要谩骂。可以各抒己见，但必须言之有据。批判与继承两者之间，批判是手段，继承是目的。这是刘明武的一个

设想，我赞成这一设想。

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这是习惯上的说法。但是，优秀的中华民族却产生不了优秀文化，中华文化却解决不了中华民族的问题；民族复兴必须依赖外来文化甚至“全盘西化”，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也再荒唐不过的悖论。为什么会产生这一悖论？这是刘明武的一个疑问，也是我的疑问。

在腐败已经渗透到学术领域的今天，文章与物欲之间已经失去了界限。一个工程师，居然在认认真真地学，认认真真地写，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刘明武研究中华元文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更好地发明创造。“二进制”推动了世界，但是《周易》里仅仅只有一个“二进制”吗？关于这一点，刘明武的看法是：抽象之象的阴阳太极、八卦、六十四卦有五个特征：一是简洁性；二是严密性；三是变化性；四是外延性；五是包容性。抽象之象的这些特征可以给人以无穷无尽的启迪。天文学家利用其制定历法，医学家利用其创造出《黄帝内经》，建筑学家利用其构筑大都市以及宏大雄伟的宫殿，哲学家利用其规范出了伦理关系，物理学家可以在其中发现量子互补原理，数学家则可以在其中发现二进制……总之，不同水平、不同学科、不同年代的人都可以站在自己学科的立场上从抽象之象——卦体——中发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抽象之象所隐含的内容博大而深邃。知道了这一点，同样可以了解中华民族祖先善于发明创造的奥秘。

我真诚地希望刘明武在抽象之象中有新的发现。我真诚地希望刘明武用自己的发明创造来证明“中华民族有文化”。

目 录

做人的理性 做事的智慧

——刘明武著《寻找元文化》序	001
21 世纪：寻找真正的中华文化	001
太极思维：中华文化的根本特征	014
“立象尽意”之意：元文化之源	034
简论“道、器、序”	052
“尚象制器”：发明创造的哲理与实践	069
“道与器”的曲折历程	086
“《易》之器”论纲	107
从“合和文化”到“纲目文化”	125
从“士商农工”到“士农工商”	144
道：宇宙本体与价值论的统一	154
孙中山与中华元文化复兴	170
“一”之论	198
寻找遗失的先秦典籍	217
重新认识元点智慧(跋)	222

21 世纪：寻找真正的中华文化

一、问 题

把中华文化视为中华民族落后的根源，把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于西方外来文化，是近百年来的文化批判运动中的主流认识。但是，有几个非常普通而又至关重要的问题没有一个学者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这几个问题是：

1. 落后状态是随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吗？早期的中华民族曾在理论研究、发展生产、发明创造各个领域内创造出了无比辉煌，那么，这个能理论研究、能发展生产、能发明创造的中华民族是什么文化所造就出来的？

2. 早期的那个文明而强大的中华民族肯定不是西方文化而是真正的中华文化所造就的，那么，又落后又挨打的中华民族也是真正的中华文化造就出来的吗？

3. 同一个文化为什么会造就出两种状态的中华民族——一个文明而强大，一个落后又挨打？中华民族的落后到底是落后在文化上，还是落后在文化变质上？

4. 苦苦地向外寻找文化，为什么不能下工夫寻找一下真正的中



华文化——就是曾造就出文明而先进的中华民族的那个文化？

二、真招牌与假货

西汉“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文化由民间的自由文化转变为官方的独裁文化。

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两千年来中华民族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是真正的儒家文化吗？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所批判的儒家文化是真正的儒家文化吗？

$1+1=2$ 。一个数学习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第二个似是而非的答案是不允许的。正确性，是数学研究的第一要求。

如果把数学中的求证方法用于中华文化的研究中，就会有这样一个发现：两千年来“独尊儒术”后所尊崇的儒家文化并不是真正的儒家文化；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所批判的儒家文化也不是真正的儒家文化。

如果把严肃的求证方法用于中华文化的研究中去，还会有这样一个发现：儒家文化只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华文化。

“独尊儒术”以后，并没有系统地运用儒家的思想，而是断章取义地利用了儒家一些零星的“语录”；尤为荒唐的是，一些对中华民族产生极大危害的“语录”只是汉儒、宋儒的创造，而实质上与孔子、孟子毫无关系。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就是对中华民族造成极大危害的“三纲”。两千年来推行“三纲”的人说“三纲”属于儒家文

化；近百年来批判“三纲”的人也说“三纲”属于儒家文化，至今还有著名学者说“三纲”是儒家文化的最高准则。如果将“三纲”进行标准化——时间、人物、具体的典籍，就会得出一个符合实际的结论：“三纲”不属于儒家文化。换句话说，“三纲”在儒家文化里既没有实际依据，也没有理论依据。“三纲”既不是孔子的主张，也不是孟子的主张，而是董仲舒的主张。虽然董仲舒主张“独尊儒术”，但是没有任何理由把董仲舒与孔孟相等同。

儒家文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界定在一个相互负责的理性范围内，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是双方负责的相互关系。具体到君臣关系上，《礼记·大学》里讲得很清楚：“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君仁臣敬是一个理性的双向负责的关系。通读儒家经典，可以清楚地看到君臣之间的理性关系：臣可以歌颂有重大贡献的君，臣可以批评有过失的君，臣也可以对变成“独夫民贼”的君进行“汤武革命”。

儒家赞颂“汤武革命”。汤伐桀，武王伐纣，为臣的商汤和周武王都没有“以君为纲”，而是对有罪恶的君进行了“革命”。《周易·革·彖传》评论“汤武革命”时所下的结论是：“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在中华民族祖先这里，君并不是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君面前还有纲，这个纲就是天道民心。君应该以天道民心为纲，违反了天道民心，臣可以进行“革命”。孔子歌颂过“汤武革命”，孟子也歌颂过“汤武革命”，两千年来的“独尊儒术”的皇帝有二百多位，有谁向人民宣讲过“汤武革命”？君有道是君，君无道是贼；君有道从君，君无道从道。从道不从君，这才是真正的儒家文化。两千年来



的“独尊儒术”的皇帝有二百多位，有谁向人民宣讲过这样的儒家文化？

儒家敬重《尚书》。《尚书》中已经有了“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的原则，这是尧、舜、禹三位圣人对接班人所作的郑重嘱托，“当天下人民遭受贫穷的时候，上天就会永远结束你的福命”。请看，在中华民族祖先这里，君应该以天下人民的生活好坏为纲，一旦人民普遍受到困苦，上天连对人民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尧、舜、禹都不保佑，试问上天会保佑那些对人民毫无贡献的、靠遗传而登上君位的阿斗之流吗？孔子专门以“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句话为依据，讲述过君民关系问题，被弟子们收录在《论语·尧曰》篇中。

孔孟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以理为纲”，董仲舒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以地位为纲”。丢掉了道理，只认同地位和权力，那会怎么样呢？只要坐到君的位置上，什么阿狗阿猫都可以为“纲”：秦始皇可以为“纲”，人民必须以秦始皇的一言一行为准——说“焚书坑儒”马上就“焚书坑儒”；汉武帝可以为纲，人民必须以汉武帝的言行为准——说“独尊儒术”马上就“独尊儒术”。判断是非的标准没有了，正常的道理没有了，一般的规矩没有了。操作重大问题，在乎皇帝一言为纲；运行如冰如炭截然相反的事，在乎皇帝一言为纲；人民前进的方向就在品质高下不一、智商参差不齐的皇帝随意摆动的手下，中华民族焉能不落后？可以回头看一下，“乐不思蜀”的刘阿斗坐在君的位置上，浑浑噩噩者可以为纲；“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坐在君的位置上，低能儿可以为纲；敢霸占后妈的隋炀帝坐在君的位置上，聚麀者就成了人民的纲；敢霸占儿媳妇的唐明皇坐在君的位置上，扒灰

者（指乱伦者）就成了人民的纲。有些社会败类一旦坐在了为夫为父的位置上，照样成为“窈窕淑女”和下一代子女的“纲”；坐在了君王位置上，依然可以成为人民的纲！天道何在？民心何在？道理何在？规矩何在？“三纲”被推行以后，君王可以侮辱天道民心，权势可以藐视道理与规矩；智慧的中华民族在地位与权势的愚弄下，变成了愚昧的中华民族。这与孔孟的主张南辕北辙，哪里是什么“儒术”？！

“三纲”的立论基础是“阳为阴纲”，这在元典中没有任何理论依据。《周易》里讲的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没有讲“阳为阴纲之谓道”；《周易》讲“阴阳合德”、《道德经》里讲“阴阳和谐”、《黄帝内经》讲“阴阳互根、阴阳平衡”，“一分为二”又“合而为一”是阴阳关系的哲学基础。阴阳之间的关系在于“合”与“和”：宇宙间，阴阳象征天地，天地合和而后才有万物生长；人世間，阴阳象征男女，男女合和而后才有子孙繁衍；人体内，阴阳象征气血，气血合和而后才有身体安康。阴阳合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础，也构成了中医理论的基础。“阳为阴纲”的立论属董仲舒的独家创造。“阳为阴纲”的提出为皇帝独裁统治制造了哲理依据。“阳为阴纲”的顺利推行，证明中华民族的理论水准与思维能力在西汉时期已经从《易》理水准上严重下降。

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可以求证出“男尊女卑”也不属于儒家文化。孔子主张从结婚第一天起夫妻之间的关系是“男女同尊卑”（《礼记·昏义》）。“男尊女卑”的主张出于《列子·天瑞篇》，列子属于道家，不属于儒家。而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的《道德经》里既没有“男尊